

英国租借威海卫始末

宋协生 刘德煜

在威海海港附近的三角花园内，巍然屹立着一座纯白大理石纪念塔。这座纪念塔建于一九三一年，塔呈三棱锥形，高三十二呎，上部正面刻着“收回威海卫纪念塔”八个魏体大字，下部正面刻有“收回威海卫纪念塔记”。这座引人注目的纪念塔，是中国政府特别是威海人民争回领土主权的标志，也是英国帝国主义在威海实行殖民统治三十二年的历史见证。

英国强租威海卫

蓄谋日久 威海卫地处山东半岛东北端，北与旅顺口遥相对峙，共扼渤海门户，形势险要，是我国北方军事要地，很早就引起英国的注意。早在一八一三年（清嘉庆十八年），英国皇家海军的阿里斯特号快帆船和里拉号单帆船曾在港内停泊，观察威海卫的形势。一八三二年（清道光十二年）七月，英国东印度公司间谍船阿美士德号，又来威海卫港湾侦察、测量了一天，掌握了海口、航道、刘公岛及港湾沿岸形势等大量情况。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及《马关条约之另约》，除赔偿巨款，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外，还增

开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军队驻扎威海卫。西方列强见清政府如此软弱可欺，便趁火打劫，在中国境内展开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激烈竞争。

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继德国占领胶州湾，沙俄租借旅顺、大连之后，英国政府见有机可乘，便急不可待地以与沙俄保持均势为借口，训令其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威海卫的要求。窦纳乐宣称：俄以旅顺为军港，则对于中国异常危险，惟有以威海卫租与英国，庶足以制俄之跋扈。明明是借机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占据中国领土的野心，却以“制俄之跋扈”为由，向清政府伸出了强取之手。不仅如此，英使还频繁活动于日本（当时尚驻军威海卫）和德国（当时已经占领胶州湾）之间，争取日、德两国的默认和支持。当时清政府欲以威海卫尚为日军占领为由，拒绝英国的要求。但英国对威海卫早已馋涎欲滴，非租不可。其驻华公使窦纳乐，一面直接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致书交涉，表示英国情愿为中国垫付赔款，要求日本从威海卫撤兵；一面致书清政府，蛮横地进行威胁：“倘中国能毁俄借旅顺之约，则英国可不租威海卫。”当时，日本同样敌视帝俄，因而对英国强租威海卫也表示赞同。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不敢抗拒英国，只得答应其租借威海卫这一无理要求。

强签租约 一八九八年六月，清政府派出庆亲王奕劻、刑部尚书廖寿恒，与英国公使窦纳乐谈判。清代表提出刘公岛之西半部陆地由中国管辖，但窦纳乐秉承英国政府的旨意，对清政府的要求丝毫不让。而清政府不敢据理力争，于同年

七月一日同英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议租威海卫专约》。这纸专约的全文如下：

今议定，中国政府将山东省之威海卫及附近之海面，租与英国政府，以为英国在华北得有水师合宜之处，并为多能保护英商在北洋之贸易。租期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所租之地系刘公岛并在威海湾之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之十英里地方。以上所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以外在格林尼址东经一百二十一度四十分之东沿海暨附近沿海地方，均可择地建筑炮台，驻扎兵丁，或另设应行防护之法。又在该界内均可以公平价值择用地段，凿井开泉，修筑道路，建设医院，以期适用。以上界内所有中国管辖治理此地，英国并不干予。惟除中英两国兵丁之外，不准他国兵丁擅入。又议定，现在威海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租地之武备有所妨碍。又议定，所租与英国之水面，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又议定，在以上所提地方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若应修筑衙署，筑造炮台等官工须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此约应自画押之日起，开办施行。其批准文据，应在英国京城，速行互换。为此，两国大臣将此专条画押盖印，以昭信守。此专条，在中国京城缮立汉文四分，英文四分，共八分。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七月一日

大清国 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硕庆亲王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刑部尚书廖

大英国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寥

不久，清政府和英国代表，在刘公岛西海岸（黄岛）举行了交接威海卫仪式。当中国的龙旗落下，英国的米字形国旗升起时，在场的中国人都低头不语，英国人却雀跃欢腾。当年参加过交接仪式的中国福济舰水兵苗秀山说：“当我们把落下的中国国旗带到舰上时，许多水兵难受地说：眼看着威海卫被英国人占领，心里比送大殓哭灵牌还难过啊！”

扩大租界 《中英议租威海卫专约》签订后，英国即派员来威海卫划租界。在此之前，英公使窦纳乐就向清政府发出照会，声称：现有本国副将路易斯至威海卫查勘地面，请总署咨行东抚，出示晓谕民人，于英员测量威海地面，勿得阻挠，其树立标记，不得损坏拔除。对窦纳乐这一无耻的训示，清总理衙门竟唯命是从，迅即电告山东巡抚，要其派员偕同并妥为照料。

关于划界范围，本来《中英议租威海卫专约》中已有明确规定，即三十三华里的范围。而英国勘界官员却无视专约的规定，一味地向外扩张，甚至竟扩到文登、荣成两县境地。对英国这种违约行为，清政府于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日曾责成山东巡抚袁世凯详审地势，据理力争。但英国根本不把中国政府放在眼里，依然按照他们的意图行事，将界线扩划到东自大岚头村东北之海滨，南至草庙子，西至马山嘴。从起点至终点，所划之弧形线，全长一百五十华里。不仅如此，还要在沿海或内地择地建筑炮台，驻扎兵丁。由此可见，英国并不以强租威海卫扩大租界为满足，而是企图将威海卫以外的内地据为殖民地。清政府当时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多次与英国驻华公使交涉。几经周

折之后，英国才勉强放弃在内地筑台驻兵的打算。但在沿海一带，仍获有大约一千五百平方英里的使用权（后来因未发生重大军事事件，故英国没有完全经管），成为英国人管辖之地。威海卫及附近沿海一带，从《中英议租威海卫专约》签订那天起，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了。

威海人民奋起抗英

同仇敌忾 富有爱国主义和民族斗争精神的威海人民，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仇恨由来日久。早在英帝强租威海卫之前，英国传教士就以传教为掩护进行隐蔽的侵略活动。至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他们在侵威日本军队的支持和怂恿下，又强占民房，兴建教堂，并公然要威海地方当局对他们进行“保护”。威海人民对他们的强盗行径极为愤恨，当时曾有七百多名群众自发地集合起来，撕下官府的公告，将英国传教士的住所紧紧包围，用石头、砖块将其门窗和屋瓦砸碎。在英国强租威海卫的消息传出后，饱受帝国主义蹂躏的威海人民义愤填膺。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狗（指日帝）扒地，鹰（指英帝）吃食，老毛子（指俄帝），干生气！”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初，英国陆军头目鲍尔奉命来威，“拟要募民千名充兵”，建立“中国团队”（亦称中国旅、华勇营），企图以此加强对威海人民的殖民统治。《中英议租威海卫专约》中，本无准许英国招募华民充其兵额的规定，鲍尔违约行事，于一八九九年建立了华勇营（当时有六

百多人，后来达到一千三百多人），威海人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积极酝酿和筹划开展抗英斗争。

狠砸界石 英帝国主义在强扩租界范围遭到反对后，一时尚不敢划界埋桩，就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派出得力官员协助他们，妄图以此转移群众愤抗的目标。清政府派出的协同英国人在威海境内勘界的官员深感众怒难犯，也不敢贸然行动，直到一九〇〇年四月上旬，中英官员才开始进行划界埋桩。

四月六日，清政府办理威海卫事宜委员严道洪、林颖启，烟台道李希杰和委办威海洋务委员候补知县程培清、文登知县陈景星，以及当时威海劣绅王承沛（慰农）等，偕同英国驻威办事大臣铎沃德所派之沙巡查，带领二百多名步兵（其中多为英国在威海招募之华人组建的华勇营士兵）和十多名骑兵，向鹿道口村西北之马山嘴奔去。当他们走到鹿道口村东时，就遇到数千名愤怒示威的群众。英国官员见状不妙，就向南乡奔去。哪知，威海南乡人民也掀起了抗英怒潮。这天上午，西武林村教书先生于冠敬和孙家滩村知识分子孙义清等，正在道北店村主持召开上万人的抗英大会。大会刚刚结束，于冠敬等便率领群众向卧龙村附近奔去。这时，英人已在卧龙西北山后坡、西泊、庙西头、东南河沟崖等处，埋上了刻有“大英租界”字样的界石。群众见了怒不可遏，大喊：“砸烂鬼子碑！”抡起镢头、大锤向界石狠狠地砸去。接着又高喊：“找鬼子算帐去！”一齐冲向卧龙东山。沙巡查见形势危险，立即命令英兵开枪。群众听到枪声，毫无惧色，继续往上冲，包围圈越来越小。这时有两名农民被英兵打死，

群众见此更是火上加油，喊声震天，勇敢地追击英兵，战斗异常激烈。

正在这时，陪同英人埋界石的清朝地方官员来了，有的坐着轿子，有的坐着“爬山虎”（双人抬的坐椅），好不威风。群众见了一拥而上，将他们团团围住，怒喊：“卖国的家伙赶快滚出来！”坐在轿子里的官员，吓得面无血色，浑身哆嗦，龟缩在轿子里不敢出来。群众对这些卖国的洋奴早就恨之入骨，“砸轿子！打卖国贼”的喊声彼伏此起。站在轿前的几名群众拖出了轿里的官员，把轿子打翻在地。此时，文登知县陈景星赶来，看到他的上司那幅狼狈相，生怕群众打到自己头上，便跪在烂泥地上直磕头，请求群众饶恕。在群众惩罚地方官的时候，沙巡查乘机向东南乡逃走，陈景星也趁群众追赶沙巡查之机搀着烟台道溜走了。

痛击英军 在于冠敬等率众砸界石的同一天，威海东南乡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英斗争，领导人是江家口村武秀才刘荆山。刘为人正直，刚毅勇敢，有一身好武功，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当英国驻威办事官把征收钱粮的告示贴到孟家庄一带时，刘荆山就串联本村武秀才江正己和北虎口村农民谢仁山，共谋抗英大计。他们原来决定利用碑口庙会日——夏历四月十五日举行抗英大会，并向各村发出了通知。当他们得知英国人又来埋界石时，便改变计划提前行动。

当时，东到泊于家，南到草庙子，北到沟北、皂埠村一带，大约有一百五、六十个村庄，都事先接到刘荆山等人的鸡毛信。四月六日这天，这些村庄的群众，还有文登、荣成边界的一些村民，都相继赶到碑口庙参加抗英集会。这时的碑口村人

山人海，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大会一结束，刘荆山便亲自把碑口南山的一块英租界石砸碎。接着又带领群众沿英国人埋界的路线前进，直到太平顶，把界石统统拔掉砸碎。

次日拂晓，刘荆山又在碑口庙外集合抗英群众向东进发，追击英军。队伍刚过临泉河，就看见一个清朝官员骑马而来，后面跟随着大批清兵。群众将他们挡住后，江正己立即走上前去高声宣读了他夜里写好的《请愿书》，递交后又痛斥了清朝官吏的卖国行为。那个官员无言以对，便灰溜溜地率队而去。刘荆山认为先对付英军要紧，然后再找这个卖国贼算账不迟，于是又率领群众继续东进。

驻扎在马井泊东河套的一队英军发现愤怒的群众蜂拥而至，急忙向垛山顶逃窜。正在垛山顶指挥埋界石的沙巡查兽性发作，竟下令向群众开枪。被激怒了的群众毫不畏惧，继续向垛山顶猛冲。刘荆山冲在最前面，一个箭步跳到沙巡查跟前，踢落了他的手枪，又一个扫蹚腿把他撩倒在地。邓家店农民于云奎迅速拣起手枪将沙巡查打倒。群众见英军头目被打倒，冲杀得更加凶猛。农民周贞德在夺下敌人一支手枪交给别人后，又去夺枪时中弹牺牲。农民唐庆举被敌人刺中腹部，鲜血直流，仍同敌人搏斗，终将一个英兵打倒，他自己也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江正己施展武功，接连打倒了几个敌人后也英勇牺牲。宋家店农民杜老仓作战勇猛，牺牲前他一人就撩倒了三个敌人。刘荆山一直冲杀在前，最后敌人集中火力向他射击，这位深受群众尊敬的抗英领袖，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群众见刘荆山被杀，怒火万丈，高喊着“为刘荆山报仇”的口号向敌群冲去，英军被迫四散而逃。接着，群众又

将清政府派来的官员围困起来。直到山东巡抚调来救援的三营清兵赶到，才撤了下来。

这场抗英斗争，给英国殖民主义者以沉重打击。英国公使窦纳乐，在事件发生后宣称：该处民人聚众，往攻英国勘界之营，有武官一员及兵丁四人被伤，民人被枪毙者三十名。在这场斗争中，威海人民遭到英人的枪杀，而会同英人勘界的清廷官员却袖手旁观，不予干涉。事后江南道监察御史高熙喆在奏折中也说：英国“办事官张贴告示，逼索丁册，并在十英里之外，民心惶惑，无所适从，以致三月初七、八两次聚众与该办事官争论此事，该办事官施放火器，戕毙二十余人，中国官员不敢计较曲直，任其惨杀。”

英国殖民主义者遭此打击后，把责任直接推到中国官员身上，说这次事件的发生，“疑系中国所派勘界之员，从中唆使”。但英殖民主义者，也不得不接受清政府避免事态扩大的请求，将勘界埋桩之事停了下来。尽管如此，威海人民的抗英斗争并未因此止息，而是在继续发展。

筹建武装 威海卫被英国强租后，广大群众积极酝酿开展武装斗争。最先出来组织办团练的是姜南庄村教书先生崔寿山。他是一个贫穷秀才。因他为人正直，富有爱国思想，群众都尊敬地称他“崔管先生”（他乳名管子）。英国强租威海卫后，他串联了本村谷辉庭，莱海村董绍亮、王惠武，张家皂村的张儒和于家布村丛志范等爱国知识分子，筹办团练，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经过长时间的发动和筹备，定于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张村慈圣寺召集团练大会。他们事前向各村庄发出了“火燎毛文书”（信封的一角插有一根用火燎过的鸡毛，表示“十万火急”的意思）。接到鸡毛信后的各

村群众，情绪激昂，都按时赶到张村。英国驻威殖民当局获悉后，便指派劣绅王承沛前往张村对群众进行欺骗宣传，以作缓兵之计。崔寿山等识破了英人的阴谋，毅然决定次日继续集会，与英国殖民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十五日清晨，崔寿山、董绍亮、张儒等领导人，提前来到慈圣寺前，在公路旁的树上挂起了红底黑字的团练大旗，张儒等人还轮番擂动大鼓以造声势。接着各村群众手执锹、镢、棍棒、铁叉、长矛、大刀和土枪等，从四面八方向张村奔来。英国殖民当局得到情报后，便命令沙巡查率领五十多名骑兵和步兵沿路堵截群众，并绕道从柳沟北山向张村扑来。

八时许，张村慈圣寺戏楼前参加集会的群众已达二百多人。土炮三响之后，年近七旬的崔寿山，挺胸健步登上戏台，向群众慷慨陈词，控诉甲午战后日本侵略军蹂躏威海人民三年多的罪行，揭露英国强租威海卫的罪恶目的，宣传了办团练以保国保家乡的重大意义，号召大家攥紧拳头与英国侵略者进行不懈的斗争。最后还宣布了行动号令：击鼓前进，鸣锣后退。崔寿山的话音刚落，英军就杀气腾腾地包围上来，并鸣枪示威，威逼群众放下“武器”离开会场。还将崔寿山等三人捆绑押赴威海。先是把崔寿山的发辫系在马尾巴上拖，后又改用独轮车推着他。崔寿山昂首挺胸，面无惧色，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威海人民的抗英斗争虽然被暂时镇压下去，但却使侵略者领悟到：威海人民是不可欺的。

这场斗争，对协同英人勘界的中国官员，也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事后，他们纷纷向统治当局提出辞呈。而清政府在洋人

面前却卑躬屈膝地表示：“虽有辞差之举，未邀允诺。”

尽管如此，英政府仍不甘罢休，向清政府继续施加压力，威胁“无论华官会同与否，均再行续勘”。但面对威海人民的连续抗击，也不得不收敛一下其凶焰。同时，他们也完全明白，如果没有清政府官员参加，划界埋桩一事，是断然不能进行的。因此，中英勘界埋桩一事，曾一度停了下来。直到一九〇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春，在英军和清军的联合护卫下才勉强在一百五十华里的租界线上，埋上了七十六块英租界石。

英国在威海卫的殖民统治

统治机构 （一）行政：英国强租威海卫后，随即设立了临时行政署，初受英国驻华海军总司令管辖，第二年改归英国陆军部，一八九九年年底，又移交给英国殖民部。

英国殖民部接管威海卫后，颁布了威海卫地方政府组织法，建立了威海卫殖民政府——大英国驻威海卫行政长官署，设行政长官一人，又称英国驻威大臣，由英皇直接任免。行政长官下设正华务司、副华务司、医官长。其具体分工是：正华务司分管财政和审理民事案件，其下属财政秘书，兼管监狱、往来文牒、公布法令章程等；副华务司分管税务、警务和审理刑事案件，其下属收税员，兼管森林、公园；医官长分管医院、船舶检疫、公共卫生等。一八九九年十一月，英国首任驻威大臣铎沃德来威，一九〇一年一月调走，由库温继任。一九〇二——一九三〇年，先后由骆赫特、白伦特、布朗和庄士敦接充。正华务司多由领事或参赞级外交官充任，副华务司，则系从香港和新加坡之警务人员中选调。正

华务司署地址在现市公安局处，副华务司署设在温泉汤西山，十几年后与正华务司署合署办公。

一九〇六年，威英当局将租借地内三百一十五个村划为二十六个总董区。这二十六个总董区又划分为南北两个行政区，北区辖九个小小区，南区辖十七个小小区。南北两区各设行政长官一人。总董区设总董一人，管理各村征粮纳税等事务。总董是由各村村董推选后报华务司委任的。每村设村董一人及帮办员一至二人。村董由村民推选，报华务司备案后任职。华务司每年支付每一总董六十元的固定办公补助费，并准许其在所辖各村群众买卖房地产时，收一元钱的契纸手续费，作为津贴金。村董无固定收入，只能在所属村民买卖房地产时，收取一元的盖印钱，作为津贴。因此，村董一职，许多人不愿担任。

（二）警政：为了加强殖民统治，威英当局还设立了警政机构。由副华务司统辖三个警区（刘公岛区、码头区和乡区），每区设英巡查一人。三区共有华人巡捕一百九十多人。在码头区还设有总巡捕房，有华人水上巡捕和司法巡捕共二十多人。在租界边缘一带，英人还设立了十五个分卡，各卡子按其地理位置的重要程度，设巡官或巡长管理。

（三）司法：英人之司法，从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开始，由英上海高等法院兼理。由于按察使驻在上海，不常来威，因此威海卫的一切民事和刑事案，均由正、副华务司兼理。正华务司受理民事案件，副华务司受理刑事及违警案件，最后由英驻威行政长官判决执行。中国人“犯法”，轻者坐“黑屋子”（看守所），重者关监狱。“黑屋子”设在码头区的东仓村，可收容四十余人；监狱在刘公岛，狱内设有

男室十八间，女室三间，共可监禁一百余人。狱内还设有绞刑架，用以处决死刑犯人。刘公岛监狱，由英国巡查任典狱官，下有男女看守长、看守员若干人。犯人对看守人员行贿，可在狱中吸到鸦片烟。女犯稍有姿色者，则难以逃出看守者的手掌。

驻扎军队 英国殖民主义者，不仅在威设立了严密的殖民统治机构，还派驻军队(主要是海军)。海上常有军舰三艘，每年四至九月份多达二、三十艘。整个刘公岛上，除为英国人服务的中国人外，全是英国海军官兵。有时英国水兵喝得酩酊大醉，拦截行人，追逐调戏妇女，或对中国属员拳打脚踢，任意凌辱。英国殖民当局所建立的“华勇营”，则驻守在北大营，也成为英国殖民主义者镇压威海人民的工具。

经济掠夺 (一)强占土地：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威海陆地租借区内，除袭占了七百多亩官地外，还强购农民土地三百余亩。在刘公岛上，袭占原官产三百零八亩土地后，又公然违背租约中“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的规定，将居民之四千八百一十一亩土地和所有房屋强行收买，致使岛上居民流离失所，嚎哭连天。

(二)征收赋税：英国强租威海卫后，即在全区广征赋税。这从清江南道监察御史高熙喆在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五月的奏折中就完全可以看出。他说：“今该国驻扎威海卫办事官出示晓谕，威海卫码头及戚家庄等十二村，钱粮税务，悉归英官管理。又云，其余十英里内租界地方，钱粮税务等事，皆英官管辖，中国官员不得过问。”据资料统计，英租威海卫三十二年，仅税收一项，即达四百九十一万三千二

百一十六元（银元）。其中只一九二九年一年的税银就是四十六万三千三百余元。以当时威海十八万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年要缴税二元五角，按当时的物价折算，约合粮食一千斤。

（三）开办洋行：英国租借威海卫后，外国商人纷至沓来，他们先后开设五大洋行：（1）太茂洋行，英人开设，代理英商香港汇丰、麦加利两家银行经营金融业，兼代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经理货运和客运；（2）和记洋行，英人开设，主要收购花生；（3）仁德洋行，英人开设，代理英商怡和轮船公司经营货运和客运；（4）万丰洋行，德商经营，经营花生并附设油坊；（5）宝隆洋行，丹麦商人经营，主要收购花生，兼营进口西药。

除由外籍商人直接经营的五大洋行外，还有英人出资中国人经营的两家商行：一是福泰行，代理美孚行办理煤油进出口手续，兼营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货运和客运；二是富威行，独家经营开滦煤和肥田粉。此外，还有泰来、永康、永盛三家商号，主要经营烟酒和副食品，专为外国人服务。

五大洋行和两家外商投资的商行，操纵着威海卫的金融、外汇和交通运输，大量地收购胶东的特产花生，进行经济掠夺。

收回威海卫的经过

逾期不还 《中英议租威海卫专约》中明确规定：“租期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一九〇五年一月（光绪三十一年），俄国被日本战败而放弃了旅顺之后，英国本应按租约规定无条件地将威海卫交还中国。当时清政府也向

英、日驻华公使提出这个问题，并由外务部发出正式照会，但英国政府却以旅顺非俄人退让为借口，不履约交还。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中九个国家举行了华盛顿会议。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发表了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提案。但英国代表贝尔福却宣称：“关于威海卫问题，英国取得此租借地，系于一八九八年，与各国取同样之行动。其时俄、德、法、英，俱有关涉。德据胶州，旨在垄断经济；英借威海卫，拟与中国抗拒他国之操纵，且欲维持远东均势，以保守开放门户之政策，而阻德俄之侵略也。至英政府，对于中国声请取消租借地之态度，可勿再赘。所有法代表提出要求（即法国不能单独放弃租借地，并应按相当条件，仿照他国移交方法，交还中国。惟所有私人权利，应予尊重，至中国收回此租地后，应担任不复将此项收回之地，让与或租与他国）与英国意见，正相符合，不必修改。英政府愿将威海卫，交还中国，以尊重中国主权，并实行开放门户之政策，惟须与各国会同办理，方可放弃此权利。今以英国政府名义声明，照此条件，英政府愿将在威海卫所得之权利放弃之。”

但是，威海卫是中国的领土，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将威海卫早日交还中国。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激愤情绪，英国代表贝尔福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三日致函中国代表施肇基等，声称交还威海卫要附以适当的条件，并陈述组织中英委员会研究此项问题及建设办法等。贝尔福提出的交还威海卫条件是：一，准许英国兵舰仍旧于夏季驶行威海卫，不加限制，不缴船钞；二，准许英国海军军需物品之存储装卸，不加限制，不征税，并保存所需之产业；三，准许英国

在威海海面训练海军，保护外人财产，准许外人参予市政。从上述条件可以看出，英国根本不想放弃威海卫；如果承认以上条件，就等于威海卫仍然由英人管辖。而中国政府却函复贝尔福说：“主要之点可照办”。

几经交涉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北平政府令派梁如浩督办接收威海卫事宜。九月十一日成立了接收威海卫委员会，梁如浩为委员长，吴应科、吴佩洸为委员。英国派翟尔士为委员长，威海卫行政委员白伦特及英国海军司令高林士为委员。十月二日，中英两国委员在威海卫开始谈判。谈判进行了五次，到了十一月初，英委员以请示英政府为借口，将谈判停顿。不久，英委员发表交换威海卫的九条意见，内容极为苛刻。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一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又与英国驻华公使代办商定，将该交涉移京开议。三月十八日，英国新任驻华公使马列克到京，与中国继续谈判。当时中国提出协议案二十三条，英国方面提出三十三条，互相交换，以作制订交收威海卫草约时参考。四月十九日中国又加派陈绍唐帮办接收事宜；英国方面也于四月底因原任代表盖曼尔回国，改派使署商务参赞福克斯为交收威海卫委员会英方代表。至五月三十一日，共谈了三十四次，才大体完毕。不久《中英交收威海卫意见书》二十四条，连同四份附件也就发表了。

这份文件公布后，因其断送国权之内容甚多，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特别是威海人民的反对，一致要求：（一）请外交部拒绝签字；（二）否认梁如浩所办交涉；（三）宣布梁之罪状，请政府撤惩。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北平政

府外交部也不得不表示《意见书》有重新修改之必要。梁如浩也因此于一九二三年七月间向政府提出辞呈。外交总长顾维钧就职后，因山东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收回威海卫之函电纷驰，并两次派代表进京请愿，便在外交部召开会议讨论。但既不能将《意见书》草约推翻，又不能置山东人民的反对于不顾，只好向山东代表表示，草约由外交部修改，将来再征求国会同意。后来，中国代表将草约中关于英国海军借用刘公岛房屋及外侨参予市政等严重影响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的条文，向英使提出修改，但英使又严词拒绝。经反复交涉，英方才答应再电请英政府考虑。当时正值英政府更易，未能获复。直到一九二四年二月间，英政府才复电说，文字形式，尚可修正，但内容实质，不能修改，如中国政府坚持改动内容，则英国政府宁作悬案处理。

一九二四年五月，北平政府又派外交总长顾维钧与英使重开谈判，磋商十数次，英方才稍作让步。双方议定专约草案二十九条及附件，较前议专约草案在文字上虽有所修正，但实际内容仍无多大改动。就是这样的一纸不平等条约，竟在同年十月由北平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英国政府亦表示准予签字。但约未签而中国政局突变（曹锟倒台），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府成立，交收威海卫案又搁置下来。

收归祖国 一九二九年六月，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又通过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提出交涉。蓝普森以交收威海卫专约草案业已于一九二四年议定，执意要照草案签字，只字不能变动。为此双方争执了数月，英国才答应与我国重新开议。谈判又进行了半年多，于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三日将草案